

1998年，住在臺北社子的李先生外出用餐，走在橋上準備返家時碰上警察臨檢，被要求出示證件。李先生覺得不合理，每天在家附近走動，都不用帶證件，因此拒絕臨檢並準備離開，警察堅持不讓他離開，他還是持續嚷嚷著：「走路不用帶證件！」

警察隨後直接對他進行搜索，李先生一氣之下辱罵警察，並阻撓臨檢，當場被帶回分局。

李先生的弟弟接到電話抵達警察局後，才發現哥哥與警察起衝突，不斷向警察解釋與道歉，並表示哥哥患有精神疾病，才會拒絕臨檢並失言辱罵。警察並未採信他的說法，認為拿不出藥袋及就醫紀錄就是裝瘋賣傻。

# 在科技的演變中守護人民的資訊隱私權

1995年立法院通過《戶籍法》第8條第2、3項，規定換發身分證須要按捺指紋，未捺指紋者，就不給發身分證。該項法規通過後，隨即受到民間團體的抗議，民間組織認為按捺指紋會有「資安」疑慮，且相關配套措施不夠完整，可能會侵害人民的隱私權。

在輿論下遲遲未執行該法的行政院，經監察院提出糾正，在2005年做出決定：如果立法院不修法，當年7月1日就會直接進行身分證的換發。此決定一出，同年6月，立法委員聲請大法官解釋，讓大法官做出暫時處分，在還沒

# 警察不能任意實施臨檢及盤查

李先生最後被以妨害公務起訴，雖然一審曾判無罪，但最後還是被判處拘役20天，緩刑2年確定。弟弟不服判決，只有國中畢業的他，開始苦讀法律書籍，到處尋求法律諮詢的協助，希望能平反哥哥的官司。

後來，案件在張炳煌律師與范文清律師的合作下提出了釋憲聲請書，大法官在2001年作出釋字第535號解釋，認為除非法律有另外的規定，須遵守：

- 警察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場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

- 對民眾實施臨檢，須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進行前應對在場者說明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

- 臨檢應於現場實施，除非獲得民眾同意或必要，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所進行盤查。除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離去，不得拖延。

這項解釋，讓警察臨檢盤查的相關規範，有了明確的標準，使國家對人民的公權力行使合乎比例原則，避免發生類似的侵害人權事件。

歡迎來到

玖迪修苑大飯店

The Grand Judicial Yuan Hotel

釋字日報

有正式的解釋之前暫時凍結該法。最後，釋字第603號解釋誕生，此項規定被宣告違憲。

大法官表示，維護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尊重人格發展之完整，是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核心價值；「隱私權」受《憲法》第22條保障，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而指紋得以監控個人的敏感性資訊，屬於資訊隱私權，以按捺指紋作為核發身分證的要件，已經違反《憲法》對隱私權的保障。就算是為達到證件的防偽、防止冒領、認屍等目的，強制民眾按捺指紋的手段，會使

全民承擔授權不明確及資訊外洩所可能導致的風險，損益失衡、手段過當，不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大法官也特別提到，蒐集人民的個人資訊，必須要和法律欲達到的法律效果具有關聯性。尤其「指紋」屬於高度私密的隱私訊息，法律必須禁止做目的外的使用。如何使用私密資訊，也應該隨著當代科技的演變，做出適當的防護措施，才會符合憲法保障隱私權的意旨。

# 兼顧勞工權益和社會條件平衡的退休金制度

《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應該按月提撥勞工的退休金，並且是專戶存儲，確保退休金不能讓與、扣押、抵銷或作為擔保。

桃園一間公司因長期虧損無法按月提撥勞工退休金，遂與員工協議，用每年給付紅利的方式代替退休金的發放。後來一名員工退休時要求公司給付退休金，公司以每年都已發放紅利為由，拒絕撥給退休金。

該名員工認為，退休金是一輩子的積累，不能用紅利的方式取代。但公司主張，當初員工明明也同意用紅利取代退休金，怎麼可以否認協議？於是，員工一狀告上法院，而公司一路敗訴，最後只得聲請大法官解釋。

該公司認為，憲法規定國家應該要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來照顧老年人的生活。現行的制度已經有勞保的老年給付，但《勞基法》卻重複制定了勞工退休金制度，把國家的責任轉嫁到公司身上，有違憲疑慮。

大法官作出釋字第578號解釋，說明《勞基法》提撥退休金的規定是強制規定，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規避。勞工身為弱勢，可以適當的方式和雇主協商出合理的退休金制度，因此，政府透過制定規範，以強制手段來達成目的，並沒有違反比例原則。

《勞工保險條例》中的老年給付與《勞基法》中的勞工退休金，均有助於達成憲法保障勞工生活之意旨，二者性質不同，很難說兩種制度即屬違憲，且憲法亦未限制國家僅能以社會保險之方式，來達成保護勞工之目的，所以立法者就整體制度設計有一定的彈性自由，也應隨社會整體發展而隨時檢討、調整。

釋字第

582

號解釋

共同被告的  
自白也要經過對質詰問  
的程序保障

1995年，一名房屋仲介遭歹徒綁架勒贖高額贖金，最後不幸被撕票。警方在辦案的過程中，透過監聽循線逮捕到黃春棋，他的自白指認陳憶隆、黃銘泉、徐自強三人為共犯。

被指認為共犯的徐自強不停喊冤，檢方仍然以其他共同被告的自白內容與徐自強也是共犯的指述，認定徐自強是本案共同被告。檢方之所以這樣舉證，是基於過去兩則判例，也就是：「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得採為其他共同被告犯罪（事實認定）的證據。」

兩則判例的核心問題都在討論，當共同被告A說出了對其他共同被告B不利的犯罪情節，這樣的陳述是否可以作為證明B有罪的證據？判例雖然要求還需要調查其他的證據來確

保A自白的真實性，不可以單單以共同被告A的說法來論斷B也是共犯，然而實務上經常用其他共同被告的自白互相補強，造成犯罪事實僅建立在其他共同被告的自白上，缺乏其他可以證明犯罪的證據的狀況。

徐自強於1996年被依共同意圖勒贖而擄人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對判決結果感到無力的徐自強，在獄中曾提筆寫下一封封遺書：「司法卻像一頭野蠻、嗜血的怪獸，它不管青紅皂白，咬得我毫無招架之力。」

在憲法上，法官究竟能不能以共同被告的自白認定徐自強有參與本案呢？此案在釋字第582號解釋中，得到大法官如此回答：刑事訴訟中的「共同被告」，是因為訴訟經濟的考量，由檢察官合併、追加起訴。被告之間的犯罪事實理應獨立存在，因此「共同被告」對其他被告來說，是被告以外的第三人，本質上應該是「證人」。

因此，黃春棋對徐自強而言，應屬於「證人」，其以「共同被告」身分所做的自白，並沒有經過對質詰問等方式詳以調查，尤其是不利於徐自強的證詞，更應該要讓兩人進行對質詰問，這樣的證詞才能作為認定徐自強參與犯罪的證據。

大法官最後宣告判例違憲，在長達20多年的訴訟中，徐自強終於還冤得雪。而大法官的解釋，也就此改變了我國刑事訴訟的樣貌。

釋字第

399

號解釋

1993年，嘉義水上鄉有位叫「黃志誠」的小學生，由於同村有同名同姓的人，父母遂幫他改名「黃志家」，想不到在學校常常被別人笑做「黃指甲」，使他深受其擾，回家跟父母說之後，父親再次萌生改名的想法。

兩次改名間隔不到一個月，被戶政機關駁回申請，當時的《姓名條例》規定：「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或有特殊原因經主管機關認定者」才能改名。內政部更有函釋：「姓名不雅，不能以讀音會意擴大解釋。」因此，黃志家的名字儘管讀起來像「黃指甲」，但也只是讀音，不能因此擴大解釋。黃家在黃志家的舅舅俞人偉的幫助下，一路陳情、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訟，都沒能成功。

黃志家改名受挫後，俞人偉要黃志家將戶籍遷至嘉義市，並再次申請改名，這次並未受到刁難，順利改名成功。俞人偉認為先前改名不成功，與戶政人員行政裁量權限過大有關，反映了當時臺灣官場的文化。

1996年，大法官作成釋字第399號解釋，宣告內政部函釋違憲，肯認姓名權是人格權的一種，人民的命名自由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

姓名為人格  
之表現，如  
何命名為人  
民之自由

此外也特別強調主管機關應該尊重申請人的主觀想法。經過漫長的改革與立法委員的努力下，改名的權利與限制不斷地放寬，現在，只要符合規定中的事由，一個人一生就有三次改名的機會，而未成年人第二次改名，則應於成年之後開始計算。

但如果是因為和同機關的人、三等親直系親屬或通緝犯同名、同姓，這種特殊情況下改名是「不限次數」的。



隨著臺灣社會風氣的改變，同志權益在眾人齊心數十年努力下往前推進，我們才得以享有更多元共融的未來。

釋字第

748

號解釋

婚姻制度不應以  
性傾向為分類標準，排除同性

1986年，一名男子在麥當勞召開記者會，向媒體承認自己同性戀的身份，並發表一連串聲明，希望促進社會對同性戀者的瞭解。該場記者會吸引了國內外知名國際媒體來採訪，就這樣，他成為臺灣第一位公開出櫃的男同志：祁家威。

過去，《民法》以婚姻為「一夫一妻」之結合，因此同性之間無法結婚。包含祁家威，多次有人聲請大法官解釋想挑戰該制度，但都未被受理。2013年祁再次結婚失敗，他先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依法用盡救濟均敗訴確定後，決定聲請釋憲。而這次大法官受理聲請，並作成釋字第748號解釋，宣告《民法》未使相同

性別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與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

眾人努力之下終於爭取到同志權益，這一刻，距他出櫃當時已過了 3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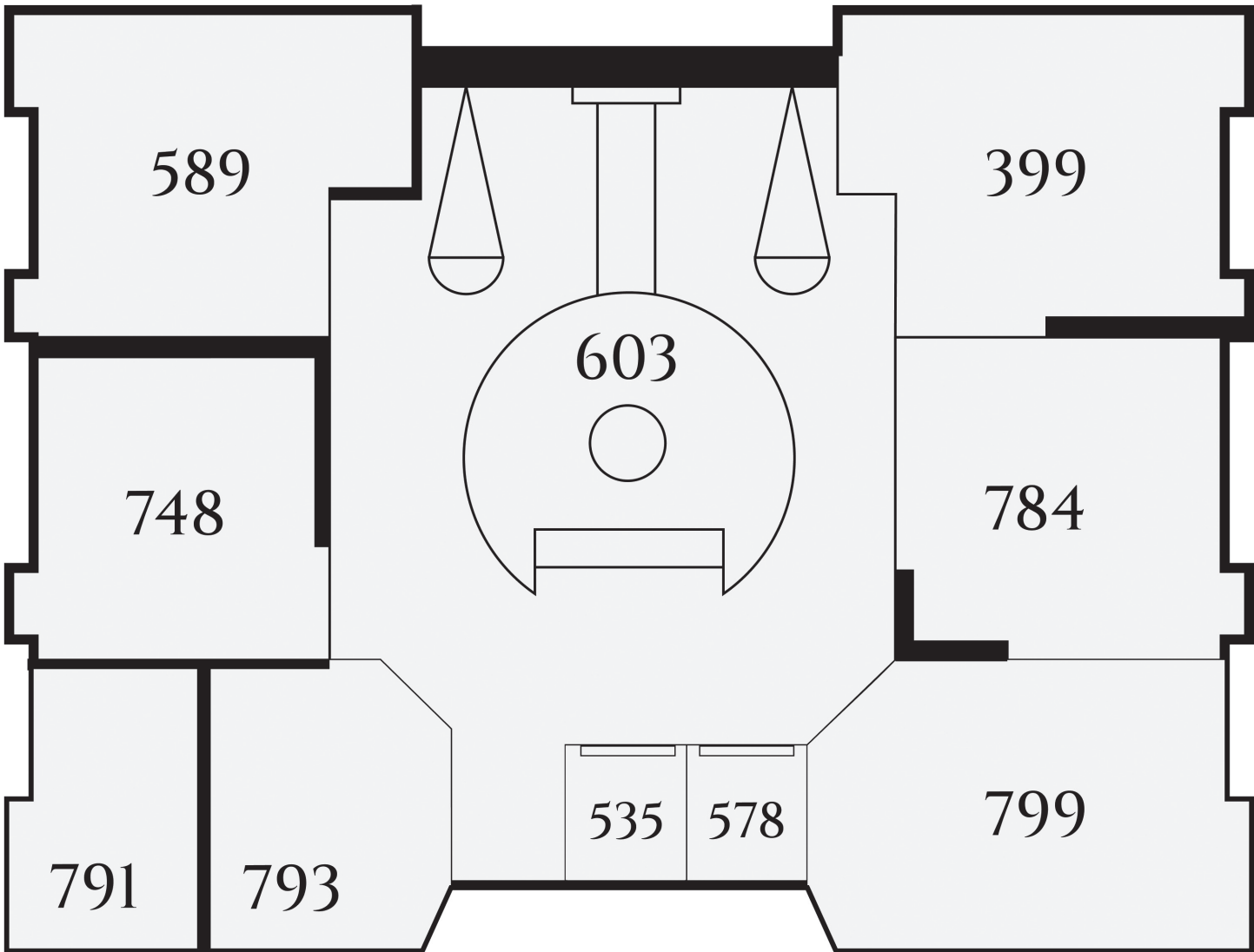
大法官在釋字第748號解釋中，認為所謂的「婚姻自由」是兩個人以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究竟是異性組合或同性組合，其實並不重要。大法官認為法律沒有保障同性的婚姻自由是重大瑕疵，違反憲法第22條的婚姻自由。

另一方面，儘管有人認為「婚姻」具有繁衍後代之功能，但法律並沒有規定一定要有生育功能才能結婚，意即繁衍後代並非婚姻不可或缺之要素。若用基本倫理作為同性不得結婚的理由，並非合理的差別待遇，亦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的平等權。

有鑒於同性婚姻具高度複雜性與爭議性，為避免立法拖延，大法官也宣示解釋公布起的兩年內，立法院需依該解釋的意旨來修正相關規定。至於用何種形式來保障，例如要修正民法或另訂專章，屬於立法形成空間。因此促成日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的立法施行。



# 有權利即有救濟，學生也有訴訟權



# 法律不應成為性別壓迫的助力

俗稱的「通姦」及「相姦」過去規範在《刑法》第239條裡，禁止進入婚姻關係的人與配偶以外的第三人進行性行為，基於保護婚姻的理由，以刑罰手段限制性自主權。這樣的限制從禮教來說，理所當然，但在執行上是否真正保障了婚姻？同等保障了男性與女性？向來有許多討論。在司法院釋字第791號解釋中，大法官再次有機會來審理這個極富道德爭議的憲法議題。

婚姻是配偶雙方自主形成的永久結合關係，除了讓配偶在精神上、感情上與物質上得以互相扶持依存外，並具有各種社會功能，是家庭與社會形成、發展之基礎，受到憲法所保障。但隨著社會自由化與多元化的發展，個人人格自主的重要性已更加受到肯定與重視，婚姻所承載的社會功能則相對弱化，因此憲法就通姦及相姦罪議題的定位與評價，也必須要與時俱進。

大法官在釋字第791號解釋變更了釋字第554號解釋，改變了過去的見解，指出不應

該將損及個人感情且主要是私人間爭議的行為，一概納入刑法的制裁範圍。而且，通姦跟相姦行為大多發生在個人的私密空間內，追訴及審判程序也必然會嚴重干預到個人的隱私。通姦及相姦罪造成的損害顯然大於所欲維護的利益，因此宣告其違憲。

另外，《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規定，原配對配偶及第三人提起通姦罪告訴之後，原配可以原諒出軌的配偶而撤告，但撤告的效力並不及於「小王」或「小三」。大法官認為，這樣的規定往往只具有報復的效果，追訴審判的過程更可能加深配偶間的裂痕，對婚姻關係的延續或挽回其實並沒有助益，手段與目的之間欠缺實質關聯，因此亦宣告該規定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權的保障。

大法官也特別提到，上面兩個規定長年實施下來，女性受判決有罪之總人數明顯多過男性，但通姦及相姦罪之成立，是男女共犯，男女人數理應相當，顯現女性在通姦罪的訴追、審理

過程中，處居於較不利的處境，亦有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6項促進兩性地位實質平等的疑慮。藉由此號解釋，抑制刑罰不過度侵害性自主權，也不讓法律成為助長性別壓迫的助力。



2014年，就讀國中的F同學，於期末考前一晚開始發燒、上吐下瀉，被醫生診斷為「急性腸胃炎」，建議在家休養三天避免傳染。因此期末考的數學、英文、歷史、地理科考試只能缺席，康復後另外補考。然而依照學校的規定，病假缺考者，成績超過60分的部分要打7折。2016年，就讀高中的C同學，則因為在校外騎機車及抽菸，被學校懲處一大過及一小過。

對於F來說，生病並非自願；而C也認為懲處違反比例原則，未給予學生及其父母陳述意見的機會，也違反相關規定。F跟C決定提出訴願與行政訴訟，但最後都被裁定駁回。

而行政法院沒有實質審查就直接駁回的原因在於，依照過去的釋字第382號解釋，只有退學這類足以改變學生身分而損害其受教育權利的處分，學生才可以提出訴願及行政訴訟。至於其他學校的管理措施，則無法提起訴願、行政訴訟。C和F認為釋字第382號解釋牴觸憲法平等權及訴訟權，聲請大法官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784號解釋變更了這樣的見解，認為依照《憲法》第16條對訴訟權的保障：「有權利即有救濟」的精神，學校對學生做的事情除了會侵害受教育權利外，也有侵害其他權利的可能，所以應該要讓學生有救濟的機會，以落實人民「訴訟權」的保障。不過，大法官也強調，學校基於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例如學習評量、其他管理、獎懲措施等），如果屬於顯然輕微之干預，仍然不能認為是權利的侵害；即使認為已構成權利之侵害，學生得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救濟，法院也應尊重教師及學校之教育或管理措施的專業判斷餘地。

大法官用心良苦，一方面落實憲法保障的訴訟權，一方面也避免學校的管理措施動輒得咎，成為訴訟的戰場，讓教育的專業，與學生訴訟權之間，取得平衡。



釋字第

793

號解釋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簡稱黨產會）成立後，將特定黨及其附隨組織的部分資產凍結，在後續的行政訴訟過程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針對《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簡稱黨產條例）部分規定是否違憲，聲請大法官解釋。

在釋字第793號解釋中，大法官表示，政黨政治的健全與民主制度的運作密切攸關，國家應該致力於建立並確保複數政黨得以自由形成發展與公平參與選舉的法治環境，使各政黨可以在公平競爭下參與民主政治。尤其就政黨財務而言，其不僅事實上影響各政黨的競爭資源和運作，以及能否履行協助人民形成政治意見的任務，更涉及政黨公平競爭機制的建構，因

此，相較於其他人民團體，國家自應對政黨財務予以適度規範。

而黨產條例違憲與否，需要考量的重點，包括：政黨因過去的黨國體制，以違反當時法令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要求的方式，從國家或人民手上取得財產，基於憲法民主原則保障政黨機會平等、公平競爭，國家應該要採取回復或匡正的措施，以確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價值。不過這些措施仍然須要符合法治國原則的要求，像是權力分立原則、基本權保障、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提供司法救濟管道等。

進一步看《黨產條例》相關的規範，其實並沒有涉及違憲政黨的解散，也沒有剝奪其賴以存

續、運作之財產，並沒有違反憲法保留原則；而立法者規定由行政機關（即黨產會），依法行使職權，亦沒有排除人民依相關訴訟途徑尋求救濟的機會，沒有侵害司法權作為終局判斷者的核心，所以也沒有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比較容易引起討論的，是《黨產條例》適用的結果，事實上會導致特定政黨成為主要受調查及處理的對象。但這是在我國政治社會背景演進下，特定政黨過往居於特殊地位的結果，而《黨產條例》的目的，是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健全民主政治、落實轉型正義，屬於特別重要的公共利益，其手段與其目的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所以沒有違反憲法的平等原則。

而要達成上述立法目的，如果不將政黨實質控制或以脫離控制的「附隨組織」，也納入處理範圍，會使不當取得財產的調查及處理發生重大缺漏，而影響重要公共利益的達成，所以並沒有違反比例原則。

此外，不當黨產源自於戒嚴與動員戡亂的非常時期下，黨國不分的威權體制，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大有違背下的產物，因此，溯及既往的規定，也具有合憲的正當事由，沒有違反信賴保護的問題。

本號解釋認為，黨產條例相關的規定並未違憲。

釋字第

799

號解釋

# 刑後強制治療制度是治療不是處罰

2020年的最後一天，大法官作出釋字第799號解釋。大法官指出，強制治療是一種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其本質上應為一種由專業人員主導實施的治療程序，並以受治療者能有效降低其再犯危險為目的，而不是對受治療者之刑事處罰。因此，強制治療不論制度與執行，都必須與刑罰有明顯區隔，否則就會抵觸罪刑法定或一事不二罰原則而違憲。

關於強制治療的期間，法律只規定「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而沒有規定確定的或最長的治療期限，大法官認為原則上並不違憲，因為性犯罪行為成因多元，個別差異很大，為了防範性犯罪行為人於刑罰執行完畢後再犯，而對社會大眾造成危害，就必須針對其個人具體情狀規劃最適治療方法與程序，因此立法者以治療目標之有效達成作為強制治療之期限，在通常情形下，算是可以合理期待受治療者可以承受的。

性侵害犯罪者對於社會大眾的人身安全、性自主權及人格權來說，存在著再犯風險；但是，如果在個案中，成為變相無限期剝奪性犯罪者的人身自由，甚至形同終身監禁，就已逾越可合理期待其得以承受之限度，違反比例原則。大法官在本號解釋中，設法從憲法比例原則、區隔原則，在各種衝突的利益中取得平衡。

《刑法》第91-1第1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1第3項規定，性犯罪者若經評估有再犯風險，即使服完刑期，亦需在特定處所繼續接受「刑後強制治療」，直到被判定「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

四位被施以強制治療的人民及兩位法官認為這樣的制度，可以無限期地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有違《憲法》人身自由保障及正當法律程序的意旨，分別聲請大法官釋憲。

總結來說，本號解釋大法官只針對強制治療制度「欠缺程序保障」的部分宣告違憲，其他部分則做成了警告性裁判，要求相關機關在3年內檢討修正，且治療處所不應再設在監獄或其附屬醫療院所；必須建立共通適用的累進性處遇指標，共築更符合憲法意旨的強制治療制度，既能有效維護社會安全，也讓受治療者能正向期待停止治療的那一天可以到來。

